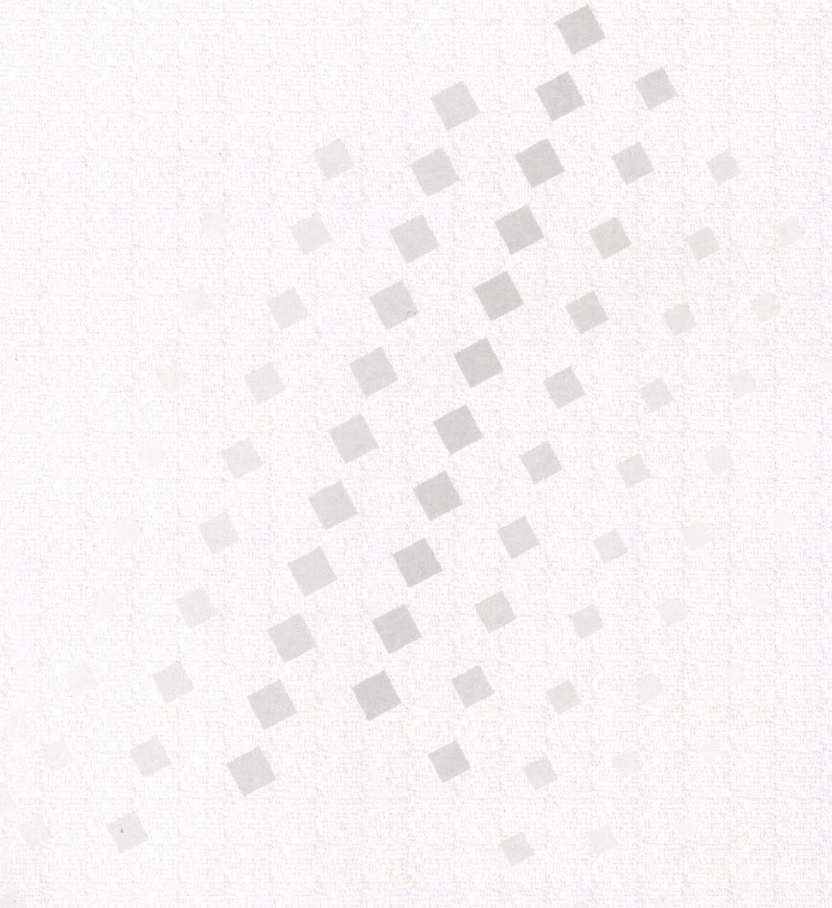


综 合 哲 学 随 笔

ZONG HE ZHE XUE SUI BI

////// 高亮之 著 /////


中国文化出版社

综合哲学随笔

一个中国科学工作者的哲学思考

中国文化出版社



中国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综合哲学随笔/高亮之 著.

—中国文化出版社, 2008. 5

ISBN 978 - 988 - 99429 - 9 - 1/Z · 060

I 综… II 高… III. 哲学. 随笔—中国—当代 IV. 479

中国文化出版社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0807145 号

综 合 哲 学 随 笔

作 者: 高亮之

出 版: 中国文化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zgwh.cn>

发 行: 中国文化出版社发行部

责任编辑: 船 舟 杨 翔

封面设计: 吴媛媛

印 刷: 北京空研丽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字 数: 180 千字

开 本: 850 × 1168mm1/32

印 张: 7. 5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988 - 99429 - 9 - 1

定 价: ¥22.00 元

版 权 所 有 · 侵 权 必 究

“君子和而不同。” ——孔子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中庸》**

“有两件事物我愈是思考愈觉得神奇，心中也愈充满敬畏，那就是我头顶上的星空与我内心的道德准则。” ——康德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 ——马克思

综合哲学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综合哲学随笔》再版序

李 锐

2005年年底，收到一位老同事寄来的《综合哲学随笔》，他同作者是浙江大学的同学，读后使我大开眼界，许多思考过的问题得到进一步的启发。首先想到的是，我1990年写的《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那篇八万字的长文中，曾对毛泽东的理论思想、哲学观点包括《矛盾论》、《实践论》作过探讨，除了阶级斗争论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误导之外，还剖析过他的“斗争哲学”思想。“动”与“斗”是他早年哲学思想的一个核心观念，既是宇宙观也是人生观；终其一生，好动喜斗，尤其实践了自己“与人斗其乐无穷”的诺言。他认为差异就是矛盾，世界无处不存在矛盾、对立，办任何事情都要经过斗争，去克服其中的矛盾，从而形成一种从理论到实践的斗争哲学。他认为哲学概念中“综合”一词，就是“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世界事物无处不存在变化、存在斗争，只是靠斗争才能最后解决问题。这样把斗争性绝对化后，就完全忽视和排斥了同一性，只有斗争性了。于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不斗则修，不斗则垮”；“斗则进，不斗则退”；“八亿人，不斗行吗”。

当年在“斗争哲学”思潮的统治下，不仅从历次政治运动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我们的哲学教科书也几乎看不到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多样的统一”了。我写这篇长文时，深深感到意识形态对社会的干扰太过份，太可怕了，这颗苦果对当代中国造成多么惨痛的悲剧。

由于自己不是从事理论研究的学人，关于哲学问题也就到此为止，不能进一步了解古今中外哲学、思想的发展同人类历史发展的关系，即人究竟应当怎样认识历史、认识世界、认识人的本质；以及有关传统哲学思想中一些根本问题，如唯物论同唯心论的对立，什么是辩证法等等，自己并没有作过深入的研究，其中当然包括斗争性与同一性的关系。作者以“综合”为核心的哲学理论，很有新意，敢于对传统哲学观点挑战，敢于创新，使我十分钦佩。

读了这本书后，同作者取得联系，承蒙他寄赠我十本，使我于2006年1月26日，得以分别给中央六位领导同志寄出，并附上一封信，全文如下：

此书值得一读，特寄上。作者是老干部，自然科学家，原江苏农科院院长，在农业气象等方面有过卓越贡献。他主要利用自然科学知识来理解哲学问题，研究过古今中外哲学名著（书中摘引书目上百种），感到我们党过去的成功与失败都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与错误及对其理解分不开。受历史责任感的驱使，作者提出一系列新的观点，形成以“综合”为核心的新的理论体系。这些观点都以丰富的实例加以说明。书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一些合理的部分，扬弃一些错误的或不全面的观点（如“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历史”，“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

等)；认为我们过去对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直采取排斥态度是不对的；近代科学的产生与发展，近代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等思想，包括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等思想，都来源于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孟德斯鸠和卢梭等人的思想；“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也同孔子的“和而不同”分不开。作者认为应当“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合理部分综合起来，构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思想。

去年我曾向你们推荐过建筑学家张钦楠先生写的《读史札记》。我深深感到，不熟知自然科学，也难弄通社会科学；对人类历史发展的普世规律，我们信仰的主义和理论，以及党本身的经历和怎样执政，都应有全面的反思。

我去年进八十八岁，为自己做了一首自寿诗，最后两句是：“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

信中特别提到自然科学问题，我确实感到我们这个党被禁锢在这种“斗争哲学”一言堂的误导中太久了，我们太不懂得人类社会发展和自然界的规律了。这使我想起过去的一件旧事，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从事水电建设工作时，就深深感到缺乏科学知识是我们这个以老干部为基础的党的一个根本问题。1955年7月15日《人民日报》三千字长的社论“干部一定要学习自然科学”，是报社让我写的。文中提到工业系统中四分之三的老干部自然科学水平只相当于初中以下的程度。“有的同志认为他们是管政治领导的和组织领导的，有了一些应用的业务知识就够了，不必学习自然科学。这些同志不了解，共产主义是在科学的基础上建起来的，辩论唯物主义同自然科学是根本分不开的，没有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就不能学好马克思主义”。我们现在建设社

会主义，“就必须掌握科学，必须懂得自然界的变化发展规律。不论工业或农业，不论基建或生产，都是同自然界打交道的，如果不懂得自然界的规律，进行政治领导和组织管理是会发生困难的。”从随后发生的大跃进运动来看，这篇社论可说是一篇空谈了。

作者是有卓越贡献的农业气象专家，有深厚的自然科学基础。他从江苏农科院院长岗位上退下来后，以一种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潜心研究哲学，读了上百部古今中外的哲学名著，他发现：不论古代还是现代，东方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所有的哲学都有合理的部分，它们之间并非是互相排斥的关系，甚至可以有机地结合。他这本书的基本思想是：在当代中国，促进“中、西、马”哲学的大综合。唐、宋两代，曾有过“儒、释、道”的大综合，推动了中国的辉煌文化。“中、西、马”的大综合，应该能推动中华民族在当代的振兴。当然，其中最重要的，是要认真吸收西方哲学中的自由、民主、法治、科学等积极因素。

作者认为，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是相当快的，人民生活也有改善。但是国家的状况并不都如人意，社会上贫富悬殊问题突出，官员贪污腐败现象屡禁不止，政治改革严重滞后，人民还不能真正当家作主，言论、出版和学术自由还受到种种限制。在国际上，强权主义与恐怖主义都带来世界的不安宁，在这样形势下，需要怎样的哲学思想来进行引导呢？虽然，现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已同马列主义并列而提，体现了对传统的马列主义已经有了一定的扬弃和修正，但是，对于中国优秀的传统哲学遗产，究竟应该怎样对待？对于西方文明进步

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西方哲学，究竟采取什么态度？以及关于哲学本身的问题，科学同哲学的关系，辩证法问题，历史唯物论和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人怎样认识世界和人的本质问题等等，过去都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究竟应当怎样理解，才有助于我们建立推动国家、社会向前发展进步的指导思想呢？所有这些问题，密切结合中国的实际，作者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以“综合”为核心，建立了新的理论体系。作者在“自序”中谦虚地说：“我只是希望这本小书，能引起读者一些思考，在理论上探讨一些问题，以有助于国家各方面的进步与发展。”

这里，我想谈一个问题，即现在我们习惯的指导思想，仍称为“马列主义”，这是一种误导。这一概念源于斯大林的说法：“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是：社会主义可以在俄国首先胜利，“无产阶级专政是由无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获得和维持的，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无产阶级是由布尔塞维克共产党来领导的。”“我们是一党专政。”“个人独裁成为革命阶级专政的表现者、代表者和执行者。”“怎样才能保证意志有最严格统一呢？这就只有使成百成千人的意志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这些列宁的话中，即表明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即等于一党专政：领袖专政、个人独裁和个人崇拜。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毛泽东的斗争哲学也来源于列宁。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文中说：“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一样。”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引用的恰恰是这段话。

我们现在搞市场经济、市场竞争经济必须公正、平等、法

治、避免垄断。我们的政治民主化必须实施宪政，党和政府都必须受宪法的约束，一切依法而治。我希望《综合哲学随笔》这本书，不仅能澄清我们过去的错误指导思想，而且能推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同步进行，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真正和谐的社会。

2007年1月14日

（此序言已载入《炎黄春秋》2007年第4期）

李锐，湖南平江人。1917年生于北京，曾参加一二·九运动，为武汉秘密学联负责人。1937年二月入党。战争年代在湖南、延安和东北等地从事青年工作和新闻工作。1958年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兼任毛泽东的秘书。1959年庐山会议上受到错误批判，下放劳动。“文化大革命”时期关在秦城监狱8年。1979年平反复职，任电力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能源委员会副主任。1982—1984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局长、常务副部长。中共十二大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共十三大被选为中顾委委员。其著述甚丰，主要有《窑洞杂述》、《热河烟云录》、《往事长短录》、《庐山会议实录》、《早年毛泽东》、《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毛泽东的晚年悲剧》、《大跃进亲历记》、《龙胆紫集》等已公开出版书籍18部，各种选集6部。

勇于创新 敢于突破

——《综合哲学随笔》初版序言

章世鸿

老战友高亮之同志的哲学著作《综合哲学随笔》出版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他是一个从事农业科学研究的科学工作者，却同时对哲学发生兴趣，孜孜以求，看了古今中外许多哲学书，写了许多笔记，并且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见解。对于哲学研究中的许多问题，敢于直率地提出自己的观点。这种精神值得发扬。坦率地说，哲学作为一门科学，要真正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必须要有这种科学的探索精神。

我们都是从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的，因而我想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谈起。

马克思认为：一切事物都处在不断变化和发展过程之中，反对一切停滞不前的形而上学观点。这就决定了马克思哲学自身也应该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之中。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这部著作中说：“我们还差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纠正我们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极其轻视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这就是说，恩格斯认为任何学说都有时代的局限性。因而，马克思学说应该是一门勇于创新、敢于突破的科学，如果不是这样，那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

西。

在这里，我想回顾一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哲学理论在中国的演变过程。

从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之前，即二十世纪初，那时马克思主义刚进入中国，显得虎虎有生气。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要推翻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它当然是站在理论创新的前哨。那时候，拥护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革命者越来越多。

但进入第二阶段，即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就复杂了。主要责任在斯大林。因为他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不但苏联党内、国内都听他的，其他各国的党也跟着他走，把他看作活着的列宁。但斯大林掌握政权后，完全丢掉民主与法制，搞个人独裁。马克思主义就被他的权力所垄断。斯大林一人掌握了“绝对真理”，其他人只能随声附和。凡有不同意见的，都成了异端，被关被杀。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就不再有创新精神，理论家的工作只剩下歌颂领袖如何英明。那时候，如果有一种创新理论，同斯大林的理论略有出入，那就会受到严重打击，置你于死地。这段历史相当长。我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图书市场充塞许多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译本，还有苏联的著名哲学家来华讲学。当时把苏联的一切视为学习榜样。这些东西，现在已经烟消云散，但流毒尚未肃清。

第三阶段则以邓小平同志的新的社会主义理论出现为标志。邓小平的理论确实是一种创新理论，对共产主义运动来说，有划时代的意义。他对某些社会主义传统理论作出了否定，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创新的轨道上来，使传统理论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可以这样说，邓小平理论的伟大历史意义是在危急时刻挽救了马克思主义，挽救了社会主义。

这三个历史阶段，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如果说，斯大林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本质，那么，邓小平理论又否定了斯大林的错误的理论和苏联失败的模式，重新回到健康的轨道上来。

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据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实践，应该跳出老的框架，与时俱进。但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曾遭到严重歪曲，因而，首先要恢复它的真面目，澄清那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而长期垄断哲学界的错误观点。

比如，将辩证法中的对立同一规律，抽去事物内部的同一性或统一性，而把对立斗争绝对化，引伸出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不断地挑起社会人群之间的斗争，特别是把这种理论引入党内，展开极为残酷的党内斗争。这种理论和实践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严重歪曲，导致人性的堕落，兽道主义盛行。

又比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辩证唯物论认识论一个基本原理。但1979年我国进入拨乱反正时期，当有人在报刊上重新提出这个命题时，理论界有的人如发现新大陆似的兴高采烈；有的人则十分惶恐，不敢表态；有的人则公然反对，说这样提是反对毛泽东，是“砍旗”。中国在哲学理论上的大混乱和大反复，其历史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再如，过去对世界哲学史的理解，完全照抄苏联的教程，简单化又粗暴化。即把历史上的哲学家简单地分为两大类：唯物论者和唯心论者，给每个哲学家贴上标签，简单地加以肯定或否定，最后则是统统加以否定，其原因无非是阶级立场问题。而且哲学界似乎永远存在着两条路线斗争这一公式化的刻板的图象，看不到各派各有所见极为丰富的内容，看不到不同的认识是怎样互相激荡、互相推移，最后融合为一种更加全面的真理性认识。

哲学家熊十力有句名言：“哲学上党同伐异的门户之见，是哲学所以没有进步的一大原因。”正因为如此，我感到建国后一段漫长岁月，中国哲学很少有建树。其原因是：如五十年代批判胡适哲学，六十年代批杨献珍合二而一论，八十年代批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由于背离实事求是精神，带来的是思想混乱。

上面这些问题，在高亮之同志这本著作中从不同视角都有所阐述。综合哲学的理论显然是在总结中国当代理论的痛苦的经历的基础上提出的，其锋芒显然是针对斗争哲学的。他的结论是：

“事物各组成部分之间可以有斗争，但主要是互相协调，互相综合。”

“从中国的历史发展与新中国发展的经验教训看，凡是坚持合或综合的方针，国家就得到发展，凡是执行分或对立的方针，国家就会遭到损伤。”

高亮之同志运用综合哲学分析历史，也否定了长期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主要动力的理论。他在分析世界史和中国史的发展过程后说：“从古今中外的众多历史事实看，很难说，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历史发展的动力应当是：科技、经济、政治、文化的综合因素的进步。”中国的现状也证明这一点，近二十年来改革开放的实践，大大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步，而这恰恰是在抛弃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之后。

高亮之同志是从事农业科学的科学工作者，综合哲学也是他一生的丰富的农业科学实践的结晶和总结。它有充分的现实依据，不是凭空的构思。这些，恰巧是专业的哲学家所缺乏的。这就是为什么，自古以来，许多新鲜的哲学思想往往是由科学家提出的，而不是专业的哲学家提出的。

以上这些，是我阅读高亮之同志这本哲学著作时的一些感受，目的是希望引起广大读者对这本著作的研究兴趣，以便共同

来开拓新的理论视野。

2005 年元月

章世鸿同志，祖籍宁波，1927 年生，1945 年 10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参加学生运动，1948 年在皖西解放区任《皖西日报》编辑。1949 年，随部队进南京，参加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接管工作。后任《新华日报》编辑。1953 年调《人民日报》。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长期担任《人民日报》驻上海首席记者。1986 年被评为高级记者。1994 年国务院表彰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有《九十年代中国纪事》、《二十世纪反思》、《视野与思考——一个记者眼里的中国》等著作。

初版自序

这本小书在2004年3月出过《初稿》，只印了一百本。分别寄送我在1946—1948年间浙江大学地下党的战友们与1948年共赴大别山解放区的战友们。

在寄给战友们这本书的同时，我也给他们写了一封信。信中有以下几段话，现引用在这里，以说明我写作这本书的本意。

朋友们：说来我们都是参加革命几十年的老同志了。我们对于党的事业、国家的建设、人民的幸福始终怀着深深的关切。

我们都为革命的胜利与国家的进步而高兴；我们也都对国家发展过程中遭遇的严重挫伤而痛心、而疑惑。

无庸讳言，不论是苏联共产党，或是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成功的同时，都有过重大的失误。苏联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肃反斗争的严重地扩大化；中国1957年的反右，1966—1976年的十年浩劫，伤害或残害了无数优秀的革命干部与知识分子。由于政治斗争的干扰，以及僵硬的经济与政治体制，使得苏联与中国的国家建设与人民生活，明显地落后于西方国家，并终于导致1991年苏联的解体。

当然，苏联与中国的历史教训，主要是由于领导人在路线与政策上的严重失误。同时，不能不说与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不够完善，以及领导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上的

偏差也有关系。马克思本人无疑是伟大的革命家与思想家，他的学说不仅在社会主义国家，即使在西方国家也博得人们的赞誉（当然也有批评）。但是马克思生活在十九世纪，距今已经有100多年。马克思毕竟不是神，不能要求他的著作中的所有论点都完全正确无误，更不能要求他能预见到二十世纪以来世界的巨大变化（特别是科学与经济的巨大进步），而使他的论点完全适用于100年后的今天。

“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宗旨。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同上），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理想与命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马克思哲学的精髓。

这些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的著作中是有一些不完全符合历史与当代客观实际的论点。其中，特别是关于阶级斗争的论点，关于“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的论点，关于否定商品经济的论点等等，对于中国，负面的影响甚大，而至今在理论上并没有完全得到澄清。

毛泽东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批评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方法。指出“他们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是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可惜他本人在相当长时期内，也不能摆脱这种错误的态度。

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理论与方针，是对于中国的重大贡献。他在经济建设上大胆地从马克思否定商品经济的观点中解脱出来，使中国近二十年来，在经济建设中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